

張景雲散文選 (1994-95)

【導 讀】

張景雲 (1940-)，早期另有筆名張塵因、張黛。十六歲就讀韓江中學高一時，因故輟學，從此自學苦讀，曾當過建築工入、臨時教員、灰料工人、獨中文員、小園主助理、家庭教師、夜總會樂隊經理等等。張景雲雖不曾受過任何大學教育，但文筆與才學出眾，深受文化界的敬重，曾任《南洋商報》總主筆、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人文雜誌》主編，現任《東方日報》總主筆。

七〇年代初，張景雲與何榮良、黃學海等人創辦人間詩社，並出版其詩集《言筌集》(吉隆坡：人間詩社，1977)。之後，張景雲轉向文化評論與專欄寫作。

一九九四～九五年間，《南洋商報》首闢一個別開生面的《星期論壇》，張景雲在此撰寫一系列文化專欄，從本地人文、社會現象之觀察與批評、東西方文學的導覽，到讀書人的心路歷程，每篇都是洋洋灑灑的三千字，有匕首之銳，亦有鉞斧之威，經常造成廣泛的討論與回響，在馬華專欄文章當中非常罕見。

這一系列的文章，後來結集成《雲無心，水長東》(吉隆坡：燧人氏，2001)，同期也出版了另一部《見素小品》(吉隆坡：燧人氏，2001)。本卷所選四篇散文，皆出自《雲無心，水長東》。

從張景雲的散文，可以讀出很典型的馬華知識份子人格：一種

卓然孤立於世俗價值之外，奮力疾書，以一己之筆墨針砭天下，力圖振衰起蔽的憂國情懷。張景雲貫徹在文章裡，就是這個理念和抱負。然而，主題或議題的正確性，尚不足以構成好文章，謀篇之道同樣重要。張景雲思辨某個議題的時候，如行軍布陣般層層遞進，常在不起眼處，埋下伏筆。行文到最後，各節所累積的論點一起產生評斷的作用，十分有力。

〈怎樣侮辱文化人〉道盡馬華社會大眾在潛意識裡對文化人的態度——看似尊崇，卻很輕蔑。這種輕蔑相當普遍地潛藏在日常對話當中，無論是商人與文人的赤裸對話，或者如文中所提及的沈姓政客那番充滿玄機的演說，乍聽不覺其謬，經作者一戳即破。馬華社會大眾對人文的輕忽態度，在此有很深的刻劃。

〈個人在至大至小之間〉從一個新聞工作者角度，深談自己穿梭在人間悲劇匯集的訊息空間，如何保持一顆清醒的心，是一篇哲理化的文化散文。〈一個讀書人的感恩辭〉從自己的苦學談起，檳城的傑弗遜中心、高等法院上的檳州圖書館，以及新加坡的萊佛士圖書館、英國文化協會等地，都成為他自修的「學校」。在馬華出版品匱乏的年代，知識的來源並沒有因此中斷，一切事在人為。最後他談到美國市鎮圖書館的採購對出版品的巨大影響力，這個機制可以扶植許多冷門的學術論著，或許實驗性較高的小說創作。圖書館對一個知識份子、一部著作、一個時代的影響力，是超乎想像的巨大和深遠。〈我們的人文文學出版業〉則提出關閉副刊以提高馬華文學創作水平的看法，否則文人持續以副刊的大眾讀者作為預設的閱讀對象，水準自然無法提升。其次論及出版品質和體制等問題。諸多建議的背後，充滿改革（以及被採納）的期待。

怎樣侮辱文化人

許多年前書店裡擺賣一本漫畫集，書名譯成中文應該是《死貓使用九十九法》。這許多年，我腹中也有一部書，可以仿照這本英文漫畫集的書名，稱為《侮辱文化人九十九法》。

不不不，我不是要談稿費問題。報館或是什麼文化機構所付給寫作人的稿費，跟先進國家甚至港台的情形比較起來，或許稍嫌微薄，也沒有白紙黑字明白約法三章，然而大多數寫作人都了然於胸，投稿或惠稿都是你情我願，不情願就封筆抗議可也。

當然大馬華文文化圈裡，稿酬偏低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文章這種貨品，價錢應該如何定才合理是沒有定論的，除開數量之外，素質如何評估就是個最具爭議性的問題。在一個自由市場裡賣文，估價的標準依然離不開那套供求律；所以一個有名氣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比方說專欄吧）即使再爛，由於叫座的關係，也比一個叫好不叫座、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更有條件討價還價，跟出版機構談條件。

不談稿費問題，還有一個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們的作家都是業餘寫作人，如果一旦他們被迫真正以寫作維生，稿費即使提高三倍，他們的產量以及產品的素質所能帶來的收入，能否讓他們維持「像人」的生活，的確是很大的疑問。

價錢與價值

不談稿費問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文化人的尊嚴受到損害，文稿的酬勞偏低還不是最重要的或實質性的問題。一份文稿或「文化產品」，即使要講「價錢」，就只能依循市場規律，藝術品和文化產品都脫離不了市場，而能以本身內在的文化「價值」來估價。

譬如梵谷（Vincent Van Gogh）在世時窮困潦倒，僅能售出幾幅畫作，而且買主是維持他生活的兄長，然而今天他的一幅畫作在拍賣會上可以千萬美元計價錢成交。我們當然會覺得這是很大的諷刺，但是在談論藝術家的尊嚴時，「已故畫家梵谷畫作以千萬美元賣出」只是一種市場現象；我們應該感覺憤怒的，卻是梵谷藝術的「價值」並未在他生前獲得適如其分的承認與尊重。

那麼，馬華文化人的「價值」有沒有受到尊重呢？如果我說沒有，讀者們可能會舉出許多例子，指出華團如何推動文化建設活動，間接反映出華社領袖如器重文化人。至於華團領袖在公開場合的談話，更是炳蔚堂皇，罄竹難書，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的簡報檔案就是最好的記錄。

我所說的以及所要的尊重，是另外一回事。已故美國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老母 Rose 說，子女們年幼時，餐桌上絕不談金錢的事，但她堅決教導孩子們「尊重金錢」（respect money）。尊重金錢是一件好事，金錢是雙刃劍，用起來是好是壞悉在用者存心，尊重金錢即是尊重自己宅心，這絕對不可與「拜金」等量齊觀。

文化人所要求的，就是希望我們的社會在尊重金錢之際，也尊重文化，尊重文化的內在價值。

讓我們借用下面的場景和對話，來解讀一般人所謂尊重文化表層底下的潛藏訊息。

兩個中年人，在中學或大學是同窗，契闊多年重逢，互相表達隔世之感。某甲是成功商人，某乙側身文化機構餬口。

甲：兄台在那裡發財？（獲乙告知辦事機構後）啊！你就幸運啦，能夠學以致用，不枉寒窗十年了。我們當年是多麼的理想派，我們那一班同學只有你對文化工作能一往情深，你真是幸運。我自己，唉！當年我也跟你一樣，抱著魯迅、巴金睡覺。都是生活逼人，如果我有像你一半幸運，我肯定會在文化界大展鴻圖，像你老兄一樣。我就是不像你這樣幸運，所以撈來撈去混得滿身銅臭，哈哈……

沒有文化的文化人

首先必須有個共識，銅臭也可以用來薰陶書香，而文化界裡也有不少沒有文化的文化人。在這裡，商人不代表沒有文化或儉俗，文化人也不能自動代表清高、有氣質和文化修養。

以上引的場景和對話，至少可以解讀出二點潛藏訊息。首先，從事文化工作只是幸運，「你騎驢我走路」只是幸運，「一簞食一瓢飲」只是幸運，而不是一種在使命感驅使下的清醒抉擇；換句話說，你衣帶漸寬是幸運。相反的，某人選擇以商求發財是「被迫」的；當然是被「生活」這撈什子所迫，沒有明說的是被自己的物欲所迫。

其次是暗示公事包裡的東西可以隨時換掉，只要把裡邊的價目單、招股書和《財富雜誌》取出，放進 Edward W. Said 和 Paul Johnson 的著作，隨時可以變成一個文化人或知識份子。用另一種說法：文化工作易如反掌，問題在於我要不要去做，做生意人麼，哼哼，可

就不是這麼簡單了！我如果搞文化工作，我的成就豈止你這麼菲薄，你若是做生意，要發達是夢想。

如果說杜撰出來的人物和戲景沒有代表性和普世性，我們再來考慮一個真實的例子。祝家華的著作《解構政治神話》舉行推介禮，邀請幾位華社名流講話，其中一位導讀是沈觀仰先生。沈先生在講話中談到他早年在大學念哲學，有志於學術，後來回國目睹國事蟻蝕，覺得應該獻身政治，從思想提升到行動。沈先生的話裡充滿了屈尊（patronizing）意味，這是在場的人都感覺到的。

雕塑比繪畫

讓我說一個故事：許多年前我住在新加坡，有一段日子在美術圈裡走動，那時有個青年雕塑家愛對畫家朋友擺「我比你高一等」姿勢，——英文所謂 one-upmanship。他說，繪畫是點線面和筆墨色彩在平面上揮灑，而雕塑則是立體造型，三度空間比二度空間難度高；言外之意聽者會可矣。畫友姚照宏（Thomas Yeo）每次見到他，總是低聲對著我調侃道：「Here comes Mr. Three Dimensions」。

我想來想去，覺得沈觀仰先生也是個「三度空間先生」。有文為證：

一九七七年我剛從加拿大威尼伯大學哲學系畢業，挾著獲全 A 高居全系榜首的威風，輕易申請得另一大學優厚的獎學金，看來不難攻獲博士學位，遲早將在北美某大學任教，四平八穩的在學術界度過餘生，老來或著書立論，或桃李滿門，人生夫復何求？（〈在自己鄉土上的異鄉人〉，《南洋商報·言論版》，1994.10.11）

沈先生是個受人尊敬的政治工作者，跟許多別的從政者不同的

是，他也是個文化修養相當深厚的人，這是難能可貴的。可是我必須指出，沈先生的談話和上引文章字裡行間透露了一種很不健康的潛藏訊息，那就是認為「行動」比「思想」高一層，因此在褒揚別的文化人、知識人、觀念人的時候，話裡暗藏某種機鋒，把人抬舉後立刻又把人踩在腳下：我比你清高！Holier than thou!

沈先生沒有告訴讀者，他是否認為本身是個成功的政治工作者，可能他體驗到政治不是容易成功的事業；他沒有選擇進入學術圈，但是他卻很肯定如果他考到博士，必然進入學術界，而且一定有相當大的成就：「遲早」是說絕無疑問，只是時間問題。

首先，沈先生對於學術成就的看法跟那些不知學術為何物的人一般庸俗。考到博士就一定能進北美大學教學和作研究？理工科或許可以，東方語言文學也還可以，哲學嘛，那就得有馮友蘭、胡適、李澤厚等級的學養。我不敢說沈先生不會有這種學養，但這是 *alternative future*，由肯尼迪總統如果未被暗殺又如何如何，桃李滿門還可以，著書立論則許多博士都交白卷，有學歷卓見可立論又何必等到老年？

多一面度

沈先生這樣看低學術，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認為學術只是思想和觀念，不及講求行動的政治。政治比學術多一個「面度」。

古往今來，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文化人／學術人／觀念人多數也是業務人（*men of affairs*），不然就是隱逸人。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期之後，分工才細密，這是另一議題。應該指出，牛頓（*Isaac Newton*）、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隨手撿幾個例子）在那個縣做官，替那個王公巨卿當幕僚，

在那個學院當院長，今天已經不比他們的學說、藝術、思想更重要了。

若是認為行動最重要，行動注重實際效果，那麼沈先生應該考慮加入陳祖排博士、郭洙鎮等的執政黨。或曰：行動黨不同他們，行動黨鼓吹民主、人權、大開放。這麼說來，行動黨正是使用這些偉大的思想觀念作為政治鬥爭的利器。這又說明了什麼？

補記：沈觀仰〈在自己鄉土上的異鄉人〉，後來收入《野地裡的政治獨白》（吉隆坡：南洋商報社，1995）

個人在至大至小之間

報紙佬彷彿都是鐵石心腸的人。在報館的編採部門，記者和編輯們互相傳遞著新聞稿，那裡邊蘊藏著外邊的世界所發生的種種悲劇；好吧，就說小悲劇，但是這許多悲劇都發生在許許多多的小人物身上，發生在他們的血肉之軀以及脆弱的心靈上，悲劇就是悲劇，無所謂小悲劇了。

一個小人物為衣食生計日夜奔波，日出而作，披星戴月回家，雖然辛苦，最重要的是出入平安，天公保佑不要在家門口碰見記者小姐（現在這行業陰盛陽衰）。從前都說人咬狗才算新聞，現在世道澆薄，連狗也瘋狂，竟然狗咬人的事情也登上報紙的大雅之堂。

總而言之，你到報館的 newsroom 裡走一圈，聽聽記者們和編輯們的談話，你會覺得做報紙這一行的人都是生就一副鐵石心腸；可以用慘絕人寰這個成語打標題的悲劇，來到記者和編輯的案頭，只可能贏得半個鐘頭到三四個小時的關注，而許多新聞更是只可付之一笑而已。

苦難不勝負荷

基督徒朋友說，上帝愛世人，也為了拯救世人，所以派他的兒子化身為人到世上。我這平凡人當然不知道他們的心靈能負荷得了人類的多少苦難。我只是個報紙佬，同時是一個可敬的女人的丈夫，兩個可愛的小女孩的爸爸，並且私心希望配得上是不少三種益友（友

直、友諒、友多聞)的朋友；此外，我也是個報紙和期刊的讀者，並且喜歡站在街邊看人。換句話說，我的心上也馱載著不少悲劇，許許多多別人的個人悲劇。我時常在納悶，一個這麼渺小的人的這麼脆弱的心靈，怎麼承擔得了這麼多的悲劇的重量。我這麼想時，我想到的是天底下那許許多多和我一樣默默地承擔這些重量的小人物。

報紙佬的鐵石心腸，其實是一種心理的安全閥，無論多少悲劇「旦旦而伐」，關心三四個鐘頭，甚或一笑置之，心理很快就恢復平衡，這樣就可以應付翌日迎面衝來了另一批悲劇。這就是報紙佬表面上的「犬儒」。

美國紐約時報有個女記者兼專欄作家，做報紙做了二十年，最近向讀者群辭別；她說「我當記者當了二十年，這份工作據說會把你變得犬儒，然而不知怎樣竟然越發使我變得理想主義。」寫到這裡，我差一點就要告訴讀者，理想主義相對於犬儒主義，就是年輕人相對於世故人。可是不對，我曾經觀察過一些青年，那種世故的嘴臉，令人一接觸就感到冷徹心底。

重建理想主義

雖說如此，我想這樣的歸類大概是可以成立的：人所以世故，當然是原來的理想主義免疫力不強，很快就被世間一個接一個的悲劇所衝擊而所剩無幾了。如果我們像魯迅那樣，看到他在〈一件小事〉裡所寫的人力車伕的身影愈走愈遠愈高，看到身邊相識的或不相識的人，或只是報紙上雜誌裡報導的一些真正無愧於「人」這名稱的人，看到他們的身影愈來愈高，仰之彌高，那麼我們有幸見證的，就正是這個叫做理想主義的東西了。

汽車要添油，馬要夜草，頭腦要「充電」，況乎人心中經受最多打擊與侵蝕的理想主義。Anna Quindlen（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位專欄作者兼小說家）說，古往今來天底下人類所面對的大問題本質上就是那麼一個：

就是當領洗者約翰說：「有兩件衣的人，他應該把一件送給一件也沒有的人。」……就是當安妮·弗蘭克說：「儘管（我們所遭受的）一切，我仍然相信人的本性是好的。」

當一個十五歲少女在納粹集中營中每天面對死亡時，仍能清醒的寫下這樣的話，我們只能說這種理想主義就是人性本身。我們心中的理想主義可能被世故轟炸的滿目瘡痍，那麼就讓我們從靈魂中提出一些撥款，來重建這座光輝的城市。

生活將是艱苦，政治將是卑鄙，錢財將是短絀哮聲不盡。然而不管怎樣，善良的是終將有人去做。

像許許多多渺小的人一樣，許多年來我都一直被兩個問題所困擾；我現在體悟到有些問題，表面上不應由頭腦去傷腦筋，實際上頭腦永遠求索不到答案，倒是心靈上最澄清最寧靜的情境中，看到一條出路。

何以有而非無

一個是關於至大的問題。過去近半個世紀，西方天文學中的一支宇宙論非常蓬勃熱鬧；宇宙論是研究宇宙的起源與演變，這是一門科學，但也是一門不能把對象放在顯微鏡下檢視或設計試驗來驗證的科學。當然，他也是從一開始就跟基督教神學（創世論 creationism）和哲學發生衝突的科學。

宇宙論所提出的一個表面上是純科學性的問題，立刻就變成一

個神學的和哲學的問題，那問題是這樣的：何以有「有」，而非有「無」？英文是這樣的：Why are there things rather than nothing？宇宙何以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當然要初步「欣賞」這個問題，首先還得把宇宙論的基本學說弄清楚。

不過這裡提出這個問題，卻不是要搞學術因為這問題一發出，它的箭頭立刻朝向我們的存在核心反射回來，而我們的存在核心就是人性。宇宙若是像創世論所說的由上帝創造出來，上帝有他特定的意旨，人類的生存（也就是你我的生存）自然有意義。但是宇宙論這門現代科學卻徹底否定了創世論。現代人類被困羈在虛無的泥沼中；世人是不是應該為自己設想出一套生存的意義，方能在這太虛之中安身立命？

搜尋心魔

另一個至小的問題，小到怎樣？小到我們要在十一歲小殺人者的心中搜尋心魔。一九九四年美國有個十一歲男童殺死十四歲的女孩，自己後來被同黨殺死，棄屍郊野橋底；前此一年，英國兩個十一歲男童從購物中心帶走一個三歲稚童，把他活活打死。這些小殺人者都還是乳臭未乾，還在抱玩具熊的年齡。

美國一份《新時世》雜誌曾做一個特輯探討這個問題，封面標出特輯主題：Children Without Conscience 這三個字，令人肝腸寸斷，令文明粉碎，令人類心碎。

我們是不是應該歸咎於電視暴力？電視劇的虛構情節與電視新聞的真實情節，虛虛實實，對從小就浸淫於電視的現代兒童的心理，會發生怎樣的影響？人類的工具理性發揮到極致，核彈和電視，這些大玩具所投下的陰影，正像鬼魅般對我們作祟。我們只看到機器

和機械性操作，卻意想不到生出一個（像 Arthur Koestler 的書名所說的）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我們，你和我，就是生在這一個至大與一個至小之間，兢兢業業的生活；生怕這一個至大和這一個至小來困擾我們，所以我們用一切隨手攫取來的東西填塞滿自己的時間，每一分每一秒，以及自己意識的每一個角落。

其實像我上文所說，這一對至大與至小的問題，都可以折返我們自己的內心，或者不是找到答案，而是看到一條出路。「Karma is boomerang」，業力是個飛去來器。你必須告訴自己，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這不是說你應該拚命而瘋狂地追求權力和財富。你必須告訴自己，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因為沒有第二個人能更好的指引你走這條人生的路。你最重要，因為某日某時在某一段路上，你見到有個人跌倒時，更無第二個人可扶他起來。你最重要，因為某日某時某一地點，你見到一隻怯生的小狗，更無第二人可讓路給它走。沒有一個國王或富翁，沒有一個佛陀或行者，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的那一件事，你最重要。

保持人性清醒

這是保持人性的方法，世界越變，人性越難保持；人性越難保持就愈值得保持，讓我們從這樣的角度理解「我最重要」，像印度教徒說：「我身是廟堂，大梵天供奉其中」，像佛陀說人人有佛性，從而保持人性。

最後，讓我告訴你一個祕密。去年病逝的傑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曾說：「我自忖我最大的成就是，儘管經歷了這一切，我仍然保持清醒。」清醒，不瘋狂，不讓狂潮將你捲走。

我是新聞工作者，國事、天下事，瘋狂多而清醒少。我怎樣保持清醒？我讀詩和小說。詩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心裡的話。小說雖糅以社會大圖景作為背景，然而其中角色都是個人，且常是像你我這樣渺小、走路常跌倒、身上傷痕如徽章的個人。詩和小說使我清醒，讓我體會「我最重要」。

補記：Anna Quindlen 後來寫了幾部長篇小說和一本家庭回憶錄。

一個讀書人的感恩辭

明天是農曆年除夕，我若是還在這裡劍拔弩張，必然大煞許多人的團圓飯風景，所以《每週評論》今天改變論調，讓我唱一唱讚美歌，頌揚一樣美麗的東西。

一位互相心儀而素未謀面的朋友張文光律師寄來賀年片，短簡上祝我「新年蒙恩」，恩是主恩；我這一生受人恩惠無可計數，我口上從來不提，因為那些深如大海的恩情，真是一說便俗，在他們面前，語言變得何其猥瑣。有一種恩惠，對我這一生影響極大，它沒有一個個體的施主，只能籠統說是社會的恩澤；或者張律師會說，這就是主恩，佛徒則會說這是因緣。

一切的恩惠都是美麗的，餐桌上的清茶，或是麵包和白開水，皆是小小的神蹟和小小的恩典；一個人越是用心生活，就越欣賞和珍惜人生旅途上這無數的小資糧。

我要說的那一樣恩惠，是書本和圖書館。書本的作用，或好或壞，大可不必去統一共識，我這裡僅能根據本身的體驗，歸納出這樣的認識，就是智能上使一個人做幾何級數的騰躍，在性靈上使一個人做天文級數的飛升。

十六輟學

我十六歲就失學，所受正規教育只到高中一，從此就輟學了；多年後吳紹葆先生介紹我給朱自存先生，履歷表理寫得清清楚楚，

南洋商報人力資源部的檔案裡還可以查得到。當年輟學，有兩方面可以談。

一九六五年我在韓江中學念高中一，第二學期期考最後一日，黃尊生校長發函開除學籍，說是州教育局的命令；當年還是殖民地時代，英國佬帶著有色眼鏡看所有華校生，稍不循規蹈矩就會被標上紅色的籤幟。所以今天聽到哪一間學校開除學生，我就會本能的怒目而視。

家境不好是另一個因素；戰後幾年經濟剛復原。社會上也沒幾個富人，不過別人也僅是家境貧窮，我則是有家等於沒有家，從初中一開始就寄人籬下。所以被開除後，也沒有人給我輔導，安排轉學，或引導我去受訓或就業。十六歲的少年，初中程度，沒有家，大河裡浮萍一片。

我想我的救贖，第一部是來自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秉質與潛能；這種自信的意識，是我在進入青草巷師範初中部念初一時發現的，是一個少年開始獨立面對外面的社會時最寶貴的資糧。在我首次讀到 *do your own thing* 的許多年之前，我已經我行我素，已經決定以本身的方式走人生的路。

第二部是發現圖書館。念初中時，英文老師周容與女士有一次帶領同學去參觀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從此我就成爲它的常客。念初三時搬去大路後投靠峇峇叔父，住的地方距離海墘緞羅申街相當遠，我還是時常踏著老爺腳車，去美新處杰弗遜中心閱覽室。

資糧匱乏

一九五〇年代。一個華校生可以獲得的知識來源還真是有限，中共建設後大陸出版的書籍不易入口，來來去去不過是高爾基

(Maxim Gorky) 和俄國大師、幾位伍日和三十年作家，以及香港的翻版書和台灣的反共讀物，多是文藝創作，評論文集難得一見，其他人文學術讀物（即使是普及性作品）更別說了。在知識資源如此匱乏的環境裡，大多數華校學生根本不知道外面還有一個等待我們去探險的知識天地。

發現傑弗遜中心，我的心靈世界開了一扇大窗。在檳城時，我常造訪的閱讀好去處，還有當年設在高等法庭樓上的檳州圖書館，以及英國文化協會閱覽室（初時在高庭旁，後遷往漆木街）。十八歲時我首次南下新加坡，住了兩年半（一九六五年尾再度南下，一住就十年），我在那裡見證了新加坡爭取自治；那兩年半我的讀書處是萊佛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設在博物館左廡）、美新處林肯中心（那時尚未遷往阿美年街，設在絲絲街口，遙對亞洲保險大廈）、英國文化協會（設在檳能律路口一幢 O 形商業大廈庭院內，早期本地畫家多假此處開辦小型畫展）。讀者中的幸運兒們可以回憶南園歲月、台大師大或馬大，我就只能談這些「廉價（免費）大學」。

年輕時袋裡沒有多少餘錢買書，謀生困難，大半時間投閒置散，要讀書就往這些地方鑽，它們成了我的社會大學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初中程度的青年，沒有停留在初中程度上，它們居功至偉。今天回顧當年求知苦況，真有隔世之感；三十餘年後的今天，環境已大大改善，書店到處可見，街頭報攤雜誌琳瑯滿目，外國書籍期刊入口無阻，經濟能力平平的中下階層家庭客廳裡擺設著整套大英百科全書。我們的後代肯定比我們幸福和進步。

現代社會需要圖書館嗎？今天人手一卷不是指書，而是指錄影帶；錄影帶也可以用於教育與益智上，圖書館的設備與服務視聽化，圖書館的社會／文化角色擴大了許多。無論新形象的圖書館提供的

是印刷或視聽媒體，圖書館仍然必須存在。不過這種需要必須重新加以界定和闡釋。

寧小毋大

國家級的中央圖書館當然可以繼續存在，不過這類圖書館的任務大抵須侷限在統籌和領導全國的圖書館服務，對公眾的顧客服務最好下放到地方圖書館身上。圖書館若要對公眾產生若何影響，首要條件是便利接觸，在這一方面一所龐大的國家級圖書館遠不如多間小型的地方圖書館。因此，圖書館規劃的首要原則是寧小毋大，寧普遍毋集中。

理想的情況是每個市鎮都有本身的地方圖書館，至於大都會如首都吉隆坡，則應在各地區分設地區或街坊圖書館。

從前讀科學小說，在美國 S.F.大師布雷伯里（Ray Bradbury）的作品裡發現到對市鎮圖書館最美麗的描寫；不久前上映的一部半卡通電影《Pagemaster》，就是通過誇張幻想的手法，把市鎮圖書館的作用與影響加以浪漫化。然而美國市鎮圖書館的影響作用一點都不虛幻，我想如果所有市鎮圖書館都不曾存在，美國文化（特別是文藝）肯定不會像今天那樣的豐富與繁榮。市鎮圖書館是文藝的育苗圃，許多作家是從市鎮圖書館開始步上文藝創作征途。

由於美國市鎮圖書館普及，圖書管理人組織遂形成一股影響強大的社會與文化力量，對出版業、學術以及冷門文藝都能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假設五萬所市鎮圖書館之中，有五千所採購，就足以使一部較冷門的學術著作不至於胎死腹中。美國短篇小說作家不多，作家多向較能賣錢的長篇小說發展；《老爺雜誌》的小說編輯說，較易於做先鋒性藝術試驗的短篇小說，這些年來尚能前仆後繼的維

持不墜，主要靠市鎮圖書館（採購短篇小說集）和大專學府（養駐校作家和開寫作班）的支持。

借閱服務

要發揮便利接觸的作用，圖書館就不能像一般受薪者那樣只在朝九晚五之間開放，在這方面，市鎮圖書館也比國家大型圖書館較有條件辦到。美國新興的社稷主義思潮中，有人設計問卷調查受訪者的合群與社會意識，其中有問你常乘公車、常利用市鎮圖書館嗎。如果你往返國家圖書館的車程得花兩三個鐘頭，它即使晚上開放到九時，你下班後要去那裡還先得三思，市鎮或街坊圖書館在這方面就親切得多。國家圖書館可以從事中央規劃，藏書偏向專門化，也可做典藏與檔案的工作，然而作為借閱圖書館卻不很適宜。這個「顧客門市生意」應分散給市鎮或街坊圖書館去承辦。

上面所寫，是對圖書館的禮讚，也算是一個讀書人的感恩辭。

我們的人文文學出版業

前幾天學海打電話來，不催實催的問起一篇序文的尾巴，忽然想到馬華文學界應該頒一個出版事業獎給他；這個想法其實是很象徵性的，因為我從來沒有寄望任何團體做這件事，或任何其他會使我感到興奮的事。

有資格膺此獎項的人，當然不僅學海一人，譬如姚拓老先生應該是首屈一指的候選人；不過以經濟條件來說，姚老出版《蕉風》和「蕉風文叢」是做慈善性質的公益事業，學海的十方出版社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慈善是綽綽有餘才能做的事，還沒有資格的稱做「傻瓜」，因為《蕉風》可算得上是姚老頭頂上的王冠。出版教科書和參考書，後世記得你也不過是個文化商人，出版《蕉風》卻是另一種等級的事功。

另一個應受表揚的出版工作者是「椰子屋」的莊若，他這個出版社很有意思，是青年文化工作者的幾個創業模範之一。馬華文化界的出版事業，大多數其實不算事業，因為資金或經費是向人伸手得來：鄉會商團頒發的出版基金、大商賈個人捐資設立的出版基金，寫作人組織向會員募集得來的捐款等等。相比之下，「十方」和「椰子屋」就很不簡單：沒有脫離出版事業的經濟市場現實，然而真正自力更生，因此更值得自豪。

妨礙提高

國忠說過這個意思：馬華文化界出版的許多書，其實並沒有出版的價值。這就是自由市場的弊病，即如民主政治的情況一樣：卑下小政客充斥政壇，有理念有操守的政治家必須經過一番淘沙取金才能見到。我個人素來也有個偏見，就是華文報一天不關閉那許多副刊，馬華文藝和人文學術著作，就難望會有突破性的發展。

文藝創作和人文著作若是始終以報紙讀者為對象，肯定水平不能提高，這是我多年來的邏輯；唯有當作家為書籍讀者、出版公司編輯或至少小型（高格調）雜誌編者和讀者而寫作時，提高水平的期望才能實現。許多年前，當馬華文藝／人文出版事業遠不如今日蓬勃之時，我就已抱著這種悲觀的看法。

悲觀是源自理想，也源自對現實的無能為力。當然我這種偏見，一半經被證明是錯誤的：在客觀環境的作用之下，諸如教育、文化等因素，儘管出版方式並無多大改變，文藝與人文作品不能說毫無進步。

出版方式無多大改變，報紙還是有太多副刊，此其一；書籍出版業比以前蓬勃，然而那是一些像學海這樣的傻瓜所帶來的個人偶然性的效果，結構性的進步並沒有發生，此其二。

結構性的進步未曾出現，三十年前是虧本生意，今天仍然是虧本生意；二十年前得靠社團出版獎金，今天仍然得靠社團出版獎金；從前沒有企業化經營，今天仍然沒有企業化經營。一切都是個人的與偶然的，因此是沒有結構的，今天可有明天可無的。

文學編輯

在「椰子屋」和「十方」之外，尚有幾個遊戲者或令人感到鼓舞的；「澤吟」、「東方」、「文橋」、「千秋」和華資中心。除開華資之

外，其他幾個小出版社都沒有可靠的資金來源以供推展具雄心與規模的出版計畫，不過「東方」至今日的業績還是較為可觀的。華資人力財力兼備，做出來的成績，《資料與研究》期刊已大有改進，幾本學術著作則差強人意，內容如何是一回事，裝禎設計顯然太不夠專業水準。

新書之中文藝作品始終佔絕大多數，而這些又幾乎全是創作集子，長篇小說猶如鳳毛麟角；我們的作家有沒有如此才情是一回事，總之今天是短小輕薄的時代，掌上小說正在流行。文藝創作蓬勃繁榮，書籍出版卻不見得能趕得上，大多數寫作人十年八年都沒有機會出書。

書問世了，推上書店就算了事，沒有新聞，沒有書評或評介，沒有哪個文化機構或文化組織給你舉辦個新書推展禮來宣傳，倒是每個月都有台灣或中國大陸名嘴作家來登台。沒有人會批評文化交流不可以搞，雖然很多情形只是有關機構通過偶像崇拜搞本身的宣傳，本地薑不辣的心態已暴露無遺，何況本地作家的作品也已在台灣或中國登陸。

文藝新書都是現成創作集子，編書的工作卻不見得有哪個出版社在做，文學編輯這一行只能在報館裡找得到。勉強要算數，女作家小說集，七家詩選之類，都是最基本的編法。一百個作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體裁多樣，題材林林總總，風格迥異，在高明文學編輯手下，恐怕也可編出一百本選集來。

翻譯交流

馬來亞獨立初期，很多人熱中於從事馬來文的翻譯工作，介紹馬來同胞的文藝作品，促進民族文化交流。如果有誰敢問三四十年

來做出了多少成績，也不會有人敢挺身回答。再說今天這種翻譯工作何以受到冷落？有人解釋說獨立後的新生代華人都會讀馬來文，所以不再有此需要。這當然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會不會讀馬來文是一回事，會不會找來讀、會不會選擇等等又是另一回事。翻譯促進交流的工作，是為草根民眾而做，不是為向當軸邀功而做；是為明天的文化而做，不是為自己今天的黨職而做。

社會教育與文化水平提高，年輕一代的文化人與知識人開始嘗試拓闢文化與學術的事業途徑，知識性、學術性的文章逐漸破土解凍，並且爭取到可觀的市場。華文報於廿五年前首闢言論版，十年前致力提高言論版的地位，這些年來不少名筆輩出，拓置了一個相當寬闊的公共輿論空間，豐富了國家民主討論的進程。

華社百科

國忠一年前曾經表示「等待一種人文雜誌」，我們的出版家有沒有足夠的膽識組織這樣一份期刊；退而求其次，各華文報相關相近版位應該為這些文章提供發表機會，甚至將它們編選結集出版。學術也好、時評也好，都需要適當的環境來培育。

我們非常需要一部《華社詞典》，這樣一部書固然可以收入華人社會的歷史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之處境與問題的條目，有關馬來西亞的歷史、地理、民族學的種種，也都需要編入，以使華人社會對這個國家有更全面的認識。歷史方面比如吉打與暹羅的淵源，政治方面如馬來亞聯盟和緊急狀態，文化方面如馬來近代文學和一九四五行列，經濟如橡膠種植史，人物如戰前戰後馬來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各個文化人。每個條目都可以寫成千字到千五字的短文，簡潔賅要，把背景來龍去脈勾勒出來。編寫這樣一部書，對任

何出版社都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也需要投入不少資金和人力，然而出版之後可供應國內市場，也可外銷到台灣海峽兩岸，而且是可以一版再版的長青書類。這樣一部書，既可在需要時翻查參考，也可作為閒書，隨時翻來作益智性或消閒性閱讀。現有的小型出版社是沒有條件推行這樣大規模的出版計畫，華資中心倒是可以。